



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有“中国先生”的美名。不过，这位“中国通”的成名作却是出版于1979年的《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那时正是日本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之际，此书为发展速度正在减缓的美国提供了一面可鉴之镜，很快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较大反响。前不久，《日本第一》中文版再版发行。

尽管已经过去了37年，但精通中日两国事务的傅高义相信，《日本第一》中所描述的日本诸多强项，不仅对发展中国家，而且对于美国和中国这样的大型经济体，迄今仍有启迪价值，“仍能激励人们思考他们为改善自己的国家还可以做些什么”。

从担忧到学习美国人确实从日本受到“启示”

《日本第一》写于日本经济快速增长的年代。而与此同时，美国的优势却在削弱，经济正在失去竞争力，逐步丧失的自信导致了内部分化，面对日本的崛起，美国的反日情绪高涨。在该书初版序言中，傅高义写道：“人民愈加不信任政府，犯罪，城市问题，失业，通货膨胀，国家的财政赤字，愈加严重。”写作该书前，傅高义刚刚从日本回国，他和朋友看着问题丛生的国家，不禁发问：美国究竟是怎么搞的？

《日本第一》的副标题是“对美国的启示”，很显然，傅高义写作此书有着很明确的目标读者。他说，写作此书时，美国人并不了解日本人取得的成绩，而他希望通过这本书让美国人知道日本人很多事情做得非常好，“至少比美国做得好”。傅高义曾在给中国学者做报告时，举例说明当时日本和美国的差距，在他看来，相比当时的美国，日本的普及教育很成功；社会治安很好，犯罪率较低；贫富差距不大；培养了非常能干的官员，而且官员腐败不严重；公司内部非常合作、团结，产品质量提高很快。“我说‘日本第一’，不是

经历“失去的20年”日本还值得学习吗？

令傅高义意外的是，《日本第一》原本是他写给西方人看的，但书出版后，中国、新加坡、韩国这些亚洲国家也将这本书作为一个重要参考，“想从日本那里学到一些关于推进现代化的东西”。

不过，上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陷入了连续20年的经济停滞状态，被称为“失去的20年”。而同时期，中国的经济保持了长期高速增长，2010年下半年，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很多中国读者读傅高义的书，会心生疑问：今天的日本是否依然值得中国学习？这也是傅高义经常面对的问题，因此他专门在书中提到了这种情绪，“我的一些中国朋友觉得，从规模上讲，中国经济已超日本，所以中国也就不再有什么要向日本学习的了，一些美国人也这么看”。

对于这种情绪，傅高义在多个场合有过回应。对于日本“失去的20年”的说法，傅高义很不以为然。冯昭奎在文章中回忆，几年前傅高义与中国学者交流时说，他也认为日本亟须改革，但日本经济发展的水平和教育、知识、国民素质水平仍然很高，日本社会比美国更节俭，日本很多公司仍很成功，很多产业仍是世界第一，在不少高科技领域，日本的出口仍然强劲，日本企业制度虽然有所改变或改进，但并没有被完全抛弃，因为这种制度能给员工一种安定感和进取心。在《日本第一》新版中，傅高义再次回应，在他看来，虽然日本的经济增速缓慢，但普通日本人依然享受着非常舒适的生活方式，维持国家运行的社会制度也运转良好，并称“对于发展中国家甚至像美国和中国这样的大型经济体，仍能给予重要的启迪”。

近日，在傅高义学术著作系列出版启动研讨会上，多位学者谈到了《日本第一》一书对中国的启示。《日本第一》的中文译者之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研究员王泰平认为，日本并不是乌托邦，世界上发达国家尚解决不了的种种问题，日本在某种程度上也存在。但是日本的工业化和

指日本经济是全世界最大最强的，而是要告诉美国人日本是如何发展的。”为了激发美国人了解日本的兴趣，傅高义特地起了一个看上去有点“唬人”的书名，让“美国人一看书名吓了一跳，认真去了解日本，学习日本的长处，让那些为自己的文化感到骄傲的美国人警醒，亚洲文化也是可以创造奇迹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冯昭奎曾撰文说，《日本第一》出版后，在日本几乎成为一本家喻户晓的畅销书。傅高义对此则幽默地回应，“我在日本‘出了风头’”。实际上，这本书在美国也成为许多企业管理者点名让员工工读的书，他们以此提醒员工们注意日本企业快速提升的竞争力。更为关键的是，借助这本书，美国人学会了以健康的心态应对日本的挑战，尽管当时的社会舆论普遍对日本的经济崛起抱有担忧，但傅高义明确表示，应该合理看待这种竞争，“懂得日本的成功之道并向其取经”。今年《日本第一》再版，傅高义在新版序言里回顾这本书的影响时说，“美国人确实从日本受教”。

现代化有将近150年的历史，今天它虽然退居第三经济大国，但是它仍然是世界上的经济强国、亚洲最发达的国家，“它的经济社会管理、教育技术水平超出我国，相比其他国家也有不少独到之处，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地方”。

“傅高义是把日本作为教育美国舆论的一面镜子。其实从中国读者的角度来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到21世纪前十年，日本的变迁可以作为观察中国的非常直观的镜子。”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任军锋认为，傅高义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学习他者要研究他者，要理解他者，在此基础上才能发现他者的根本，他者优秀的品质，才能学会取舍。这可以用来反思我们认识西方，认识日本，认识其他国家和文明、传统的方式。”

最为关键的是，在王泰平看来，向日本学习，可以解决我们“成长的烦恼”。王泰平举例说，当年令人头疼的难题，比如环境、交通，日本今天大都解决得很好。因此他建议，我们不妨研究和借鉴日本的经验，看看日本是怎样走过来的，比如日本企业节能减排的经验、建立循环经济体系的经验、城乡一体化的经验，还有对企业文化、敬业精神、团队意识的培育以及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等都值得借鉴。

在《日本第一》一书中，日本的学习精神被摆在显眼的位置。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冯玮认为：“日本的学习能力在世界上首屈一指，日本发展到今天离不开这种能力。日本不仅善于对外学习、向敌人学习，其对内的传承也值得研究。”冯玮认为，战后日本重建在很大程度上传承了历史。“日本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各得其所，每个人做好自己的分内事。分工明确是工商社会的特点，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础要素。我们要看到，日本既接受西方适者生存的自由竞争，同时也传承了历史，注重公平，这是日本给我们的启示。”

傅高义《日本第一》再版——一位『中国通』眼里的日本启示录

向日本学习与排行或其他无关——评《日本第一》

□卢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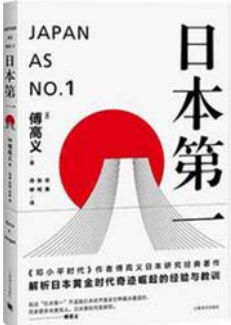
“日本第一”这个让人怎么看都不舒服的标题，乃是诞生在二战后“美国—日本”这一既定的国家间附属关系当中；它首先挑战的，是“美国第一”的心理位次。在傅高义看来，相比于幅员也辽阔、资源也海量、自信心也爆棚的美国，日本仍能“第一”的秘诀一言以蔽之，就是充分摄取信息和广泛的事前协商。傅高义花费了大半篇幅娓娓道来，日本的政治家、省厅官僚、大企业财阀、农协会员、记者俱乐部成员和普通上班族们是如何在位谋政，为培育自己的基础经验和职业自信而谦卑地进行游历式的磨练和全方位的信息沟通，同时他善意地提醒，相对来说，美国却并不是一个善于聆听的国家，“在许多时候，日本人对美国人的了解比美国自己还要多”。

或许正是为了探讨这个关于“信息”的故事，与《菊与刀》的作者主要依赖间接的资料不同，与他本人观察邓小平时代的中国的方式不同，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开始，傅高义用了多年的时间让自己充分融入日本社会。入乡随俗是经典的人类学手法，而傅的着眼点仍在于宏观的社会学，即政治、经济、教育、福利和犯罪问题。他着力探索日本官界和政界的博弈。尽管作者承认，各界充分的事前接触必然免不了黑金交易，然而比起突显闹剧和阴谋论，他更强调日本官僚较少遇到政治压力这一点。此外，在一个以“协商”为政策指向和基本文化氛围的社会里，官僚即使拥有特权也无法个人独大，而他们辛苦工作所获得的声望和成就感也大大超过了金钱欲。如此一来，不必通过刻意的“防腐”手段或者煞有介事的分权，就能达到廉政的效果。日本的精英官员们能够向社会释放更多的想法和可能性，而对于其领域内的企业也只是提供各种平台和建议，不愿也不能直接加以控制。

如此这般从正面的意义上讨论充满矛盾的社会问题是本书最大的特征，也是作者一贯的学术风格。在多数时候，人们都批判官僚体制的繁冗和束缚，而本书的调查显示，尽管日本人也会发出卡夫卡式的抱怨，仍然没有哪个现代国家的公民会像他们一样，为身为高度发达的集体动物而由衷自豪。终身雇佣制(该制度至今仍是主流)提供了领导层的稳定和政策的连续性，而不断调职则带来了灵活和润滑。总之不论日本人活得如何“累”，与他们所献身的行业充分结合这一点本身已经形成了一种坚执的情趣，而他们所服务的团体的承诺则多数都得到了兑现。如是种种，尽管日本人的幸福指数在全球排不上前列，考虑到社会性和个体自由这对经典矛盾在多数国家的实践情况，日本人的平均生活或许已经达到现代人劳瘁的浮世人生的最高标准了。

在整部著作中，傅高义都没有运用“日本性”之类的字眼。但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来，使他着迷的同样是这个。他能够解释日本社会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双向动员和自我动员，却不能解释其所以然。尽管总体上的单一民族设定为日本带来了管理的便利，它在历史上也曾长期四分五裂；而现代日本社会却通盘合作、克服难题，愣是把群体结构拼成了头尖肚圆的纺锤体，其实是一个社会心理学的谜。社会学家解释问题或许缺乏诗学的吸引力，但他们的努力同样是让人类过上诗意的生活，他们的困惑和难题也是。最终，这位老资格的哈佛教授想表达的是，座次与否无关紧要，那些多数人所向往的东西，值得我们向任何人学习。作为社会学者，他需要就此发言、建议、协商，三十年前和之后都是如此。

(据《文汇报》)



出品：副刊编辑中心
设计：壹纸工作室
本版编辑：曲鹏
美编：牛长婧